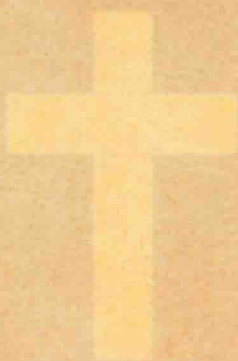


程小娟 著

God 的汉译史

—— 争论、接受与启示



A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GOD:

CONTROVERSY, RECEPTION
AND INSPIRAT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程小娟 著

God 的汉译史

—— 争论、接受与启示



A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GOD:

CONTROVERSY, RECEPTION
AND INSPIRAT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God 的汉译史：争论、接受与启示 / 程小娟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 - 7 - 5097 - 5265 - 4

I. ①G… II. ①程… III. ①基督教 - 名词术语 - 英语 -
翻译 - 研究 IV. ①B97 ②H315.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5192 号

God 的汉译史

——争论、接受与启示

著 者 / 程小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统筹 / 王 绯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李 响

责任校对 / 李 俊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265 - 4

定 价 / 65.00 元

印 张 / 18.5

字 数 / 290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得到河南大学文学院学科
建设经费资助

序 言

翻译的运作过程是将一国语言转换成另一国语言，其难点在于从原文和译入语中找出彼此对应的概念、术语和范畴，实现文化信息的忠实传递而避免由误译造成的意义增添、遗失或扭曲。若译入语中不存在相应的语词，而它们在原文中又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性，译者就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不得不努力找出乃至造出适当的对应词，甚至达到殚精竭虑、皓首穷经的地步。一些译者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面前望书兴叹，就是因为书中使用了一套意义全新的概念范畴，使人难以找到相应的译词而无从翻译。更为典范的例子当属圣经汉译史上对“God”（及其希伯来文名称 Elohim、希腊文名称 Theos、拉丁文名称 Deus）的移译。由于缺乏内涵对应的汉语词汇，围绕着该词的译法，历史上曾发生长达三四百年的“译名之争”。如今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化论争已成为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不少学者追踪和研讨的对象，且取得多项研究成果。本书作者程小娟运用透视文化相遇问题的互动交流范式，扼要勾勒出在华传教士讨论“God”译名问题的历史脉络，相当全面地梳理了19世纪下半叶新教传教士对此问题的争议，以及中国读者对God及其译名的理解和接受，在实证考察的基础上诉诸诠释学和传播学的理论思辨，对文化交流中时常遇到的“可译性”、“诠释冲突”、“传播困境”等难题谈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学界对圣经汉译、传播及接受问题的研究。

曾几何时，基督教传教士在欧美地区的传教活动堪称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公元5世纪入侵欧洲的蛮族摧毁西罗马帝国，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一扫而光，那时的欧洲土著民族大都处于文明发展的低级阶段，没有系统的文字，更谈不上书面文化传统，传教士们几乎是在当地文化的一张白纸上毫不费力地写下了耶稣基督的福音。17世纪上半叶，伴随着“五月花



号”航船负载第一批清教徒到达北美洲，类似的历史在美洲大陆再度上演。然而，传教士在中国却遭遇到一种业已历经数千年发展的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的顽强抗衡，一如著名海外汉学家谢和耐教授所论：“中国可以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交流与接触，某些中国人，甚至是某些中国文人士大夫和精英分子，也可以受归化成为基督徒；基督—天主教可以作为中西文化撞击交流的一条主要管道，中西双方可以在真正了解或误解的基础上，达成某种程度的表面共识。但是，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化’，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绝不可能像西方或其他某些国家一样，成为一个基督—天主教国家。中国始终在强烈地坚持自己那悠久的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儒家文化虽有开放性和兼容性，但其‘同化性’却表现得更为强烈。”^①而译名之争所折射出的，其实就是中西文化遇合时的深层次关系。明末清初以降，传教士的基础性工作亦即核心活动之一是将圣经翻译成汉语，其间对上帝名称“God”的移译堪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遇、相识、碰撞、冲突、磨合、融通的重大聚焦点。鉴于首位日文译经者弥次郎犯过将“Deus”译成佛教神之“大日如来”的致命错误，耶稣会远东传教士的先驱者沙勿略提出音译原则，将“Deus”译成“徒斯”。但由于信众难解“徒斯”之意，罗明坚遂将其意译成“天主”，该词取自《史记·封禅书》。这一译名为利玛窦所接受，他进而以汉语古词“上帝”作为“天主”的补称。后来新教传教士马礼逊、马士曼又用中国人自古就熟知的“神”翻译“God”。此外，先后提出的相关译名尚有“上天”、“真神”、“神天”、“天帝”等等。所有这些意译名称的共同特征，都在于试图借用已有的汉语词汇转达“God”在圣经原文中的本义，但由于它们无不承载着中国文化的深广内涵，每个译名又皆无法与“God”的本义全然对应。由此，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就成为传教士们长期争论的焦点，那场争论的过程及其寓含的诠释学和传播学原理则成为本书的关注点和切入点。

本书以较为丰富翔实的资料既系统地论述了传教士对“God”原文和译入语的理解，对中国读者及自身翻译传统的认识，亦论述了中国士大

① 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增补本）》，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代重版序，第2页。

夫、神学家（包括梁发、洪秀全等）以及现代作家对 God 及其译名的独特理解和接受。作者分别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对这一极其复杂的中外文化交流现象作出条分缕析且富有深度的研讨，其中一些思路和观点颇有新意。例如，以往学者主要就 19 世纪上半叶新教在华传教士的译名论争进行个案研讨，本书则从史的线索入手，将译名论争上溯至 16 世纪末叶，下延到 20 世纪上半叶，并将对“God”的翻译与接受问题合为一体进行综合研究，明显拓宽了观察的视野。又如，作者论述中国作者群在《万国公报》“圣号”讨论中对译名的理解时，对所论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分析，得出的观点也令人信服。

本书作者程小娟勤于研习，早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以其《林语堂与北村——世纪初与世纪末中国现代作家皈依基督的不同模式》在香港举办的论文竞赛中获奖。她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新文学与外来文化方向的博士生，但不囿于只在现代文学框架内考察新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而寻求在更大的范畴中展开研究，显示出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本书将“God”之名的翻译和传播问题置于一个宏大的文化系统中，那便是基督教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史。作者认为，从接受的角度看，新文学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关系史的一部分；从文化交流的完整过程观察，接受是文化传播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将接受放在文化传播的完整系统中思考，势必要把作为传播主体的传教士的活动吸纳进来，以便为接受提供源头上的参照。在如此广阔背景下展开研究，无疑有助于深化学界对中国新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全面理解。

对于如此一个跨越诸多学科的研究课题，作者擅长将文学、哲学、神学、译介学、诠释学、传播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理论，以及宗教学、圣经诠释学理论较为熟练地运用于写作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理论素养和思辨功力。作者具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对 God 汉译及传播史上的不少课题进行了较为明晰的梳理和富有深度的分析，在整理资料和驾驭语言方面也达到较高的水平。书中的原始资料主要取自 19 世纪在华传教士编印的英文报刊，表明作者已具备灵活运用英文资料乃至希伯来文、希腊文专用术语的能力。作者亦可运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学术语言行文，大体实现了运思表意的确切、凝练和明白晓畅。



由于本课题覆盖的历史跨度大，学术焦点纷繁复杂，书中的某些结论尚待斟酌，对一些问题的研讨也有待进一步深入。全书上篇主要围绕着译名之争论述“God”的翻译和传播，下篇（尤其第七章）着重探讨中国人对上帝观念的接受，二者似乎不够协调。对于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我相信作者会不断有新的进展。

梁 工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河南大学

目 录

导 论	1
一 研究缘起	1
二 方法论	2
三 本书各部分内容简介	7
四 本书期望获得的成果	10
五 用语说明	11

上篇 传教士关于“God”汉译问题的讨论 及其引起的反思

小 引	15
第一章 圣经汉译中“God”翻译讨论的历史	17
第一节 明末清初天主教的译名之争	18
第二节 新教早期的译名争论	20
第三节 1877 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前后的译名讨论	24
第四节 1890 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前后的译名讨论	27
第二章 新教传教士译名讨论中的主要分歧	30
第一节 传教士对原文理解的分歧	32
第二节 传教士对译入语理解的分歧	43
一 对中国宗教观念及语言的总体看法	43
二 对“上帝”的理解	47



三 对“神”及“灵”的理解	55
第三节 传教士对当下读者的不同看法	64
一 读者的理解是否可靠	65
二 读者之间的理解差异	67
三 对读者理解案例的理解分歧	71
第四节 传教士对自身传统的不同理解及其个人取向的差异	74
一 对西方传统的不同理解	75
二 对传教士之中国传统的取舍与理解分歧	80
三 个人取向的差异	83
 第三章 新教传教士提出的译名解决方案	85
第一节 妥协的方案	86
一 妥协共存	87
二 妥协统一	90
第二节 不妥协的方案	94
一 反对当下的妥协方案	95
二 交给时间和中国基督徒	96
 第四章 对传教士译名讨论的反思	100
第一节 可译与不可译之间	109
一 翻译理论的分歧	109
二 传教士间的分歧	110
三 “必须表述”下的追寻	113
第二节 诠释的冲突与解决	117
一 诠释的冲突——共时的考察	120
二 解决的趋势——历时的考察	126
第三节 传播中的两难与犹疑	131
一 求同与求异之间	132
二 学习——含混带来的困难与解决	135

下篇 God 在中国历史上的接受情况 及其对译名问题的启示

小 引	143
第一章 明末清初士大夫对 God 及其译名的理解	145
第一节 从教者的理解	149
一 徐光启	150
二 李之藻	153
三 杨廷筠	155
四 王征	159
五 严谟	161
第二节 反教者的理解	165
第二章 19 世纪新教接受者对 God 及其译名的理解	170
第一节 新教早期接受者梁发和洪秀全对译名的理解	170
一 梁发对 God 中文译名的理解	170
二 洪秀全与拜上帝教对译名的接受	177
第二节 在《万国公报》“圣号”讨论中中国作者群 对译名的理解	180
一 独立的观点	181
二 理性的证明	187
三 宽容的态度	191
第三章 20 世纪上半叶 God 的接受情况	196
第一节 基督教神学家在上帝观方面的调适	200
第二节 受基督教影响的现代作家的接受	210
一 理解耶稣：伟大的人格	213
二 冰心：爱的造物者	222



三 许地山：非一神论的上帝	229
四 曹禺：作为神秘主宰的上帝	238
五 萧乾：被质疑的上帝	241
余论：从接受角度对译名问题的再思考	254
一 可译与不可译的再思	254
二 诠释的再思	256
三 传播的再思	259
参考文献	262
后 记	282

导 论

一 研究缘起

圣经对人类的启示不仅在书内，同样也在书外。所谓书外的启示，即如这本书的翻译、传播、接受史和解释、研究史带给人类的启示。它广泛涉及神学、哲学、宗教学、文学、翻译学、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与各领域间常常是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的。而圣经从其产生之日就具备的跨文化传播的特点更使圣经的这些外部内容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研究课题。作为圣经外部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中文翻译与接受问题也就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圣经承载着一种相当不同的文化进入中国，汉语译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若从景教传入算起，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其全部或部分经文的译本总计已有三四十种之多，这在圣经各语种翻译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即在今日，中文圣经重译的工作仍在进行，关于圣经翻译的争论仍然不绝于耳。这一翻译传播过程经历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面临过各种不同的处境，中文圣经翻译和传播最活跃的时期又正是近代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时期，这些历史特点使之蕴含了特别丰富的文化交流信息。回到历史之中看，中文圣经翻译和传播的每一阶段和其中的每一个重要问题都绝不只是翻译史所勾勒的那么简单。史料的阅读会让我们认识到，圣经的翻译和传播是处在一个由各种力量交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的张力场中，最后所呈现出来的翻译和传播的结果正是这种合力作用的成果。相应的，圣经在中国的接受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穿越了不同的历史语境，并与它的传播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所有这些，使圣经中文翻译传播与接受成为一个包含着密集的文化、历史信息的跨文化交流事件。



人类总是有着强烈的把握和预测世界的冲动。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愈来愈关注文化交流的问题，种种相关的研究著作渗透着探寻文化交流规律、把握和预测文化交流过程和结果的意图。对中文圣经翻译传播和接受这一跨文化交流事件的研究正可以以史为鉴，为文化交流的探讨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当然，这种探讨本身也有利于对中文圣经翻译传播和接受自身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和诠释。

与历史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却相当匮乏。德国学者尤思德在他的著作中感叹：“中文圣经翻译历史的错综复杂，刚好与学术界对其研究的匮乏成强烈对比。”^① 翻译研究如此，接受研究亦然，而将二者结合的综合研究就更是凤毛麟角了。然而，作为文化交流的完整过程，翻译传播和接受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将它们加以综合考察，我们才能够从中得到最有价值、于我们最为准确和适切的启悟。

但是，这样宽泛的研究将会浩大而困难，为了使研究具有可行性，我们需要从中提取出一个有代表性的焦点来，而“God”的翻译与接受问题无疑是最恰当的选择之一。God 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观念之一，它的汉译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传教士间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God 观念的接受是中國人在基督教接受史上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而关于 God 的翻译和理解也是传教士和中国人之间有较多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些特点使“God”的汉译和接受具备了作为文化交流研究案例的典型性。然而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远远不够。^②

鉴于此，本书选择了“God”汉译中的争论与接受这一研究课题，力图发掘其中所蕴含的启示意义。

二 方法论

钟鸣旦在其《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③

① 尤思德：《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蔡锦图译，国际圣经协会，2002，第1页。

②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行文中的学术史回顾。

③ 钟鸣旦：《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刘贤译，载吴梓明、吴小新编《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第一届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3，第31~80页。

一文中总结了百余年来学者研究中欧 17 世纪文化相遇历史的四种范式。

他首先厘清了对文化交流产生影响的五个不同因素：传播者，指将资讯传递给他人者，作为泛称，包括个人和群体；接受者，指所传资讯之潜在的接受者，同样是个泛称；资讯，指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沟通的资料、思想、世界观、观点等；手段，指资讯得以传递的方式，如文本、文化习俗、社会组织等；最后，还有观察者，是指交流过程的观察者，可以是描述交流过程的当代人。^① 接下来作者介绍了各个范式的主要特点，并加以评估。

1. 传播类范式

这类范式的主要焦点在于传播者的角色，关注传播者采取了什么方法，产生了什么效果，如果设想的成效达到了，该方法就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这种方法认为，理想化的知识交流存在于“纯粹的沟通”中，就是说，如果要传播的资讯对于传播者和接受者来说完全一样的话，传播就成功了。资讯能够独立于传播者之外，丝毫不变地被接受者接受。还有一个假设是，把实际的真实等同于观察到的真实，这影响到了观察者的定位。事实上，这些假设是难以成立的。这一范式还涉及影响，并将此作为一个评价标准，但在操作中这是无法衡量的。^②

2. 接受类范式

这类范式研究的中心不再是作为传播者的传教士，而是作为接受者的中国人，关注的问题是：对基督教和其他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人作出了怎样积极或消极的反应？这一类范式的研究“以中国接受者撰写的中文文本为起点，中国人被认为是这些文本的唯一作者”。观察者观察到资讯在被接受时经历了很大变化，传播者所传播的与接受者所接受的是不同的，并把这种变化视作接受者对资讯的“误解”，而很少视之为某一种理解或理解的结果。这一范式的研究仍然把主客体截然分开，假设了接受者没有或不会改变，并将资讯的改变放在历史情景、语言情景或者社会情景里分

① 钟鸣旦：《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刘贤译，载吴梓明、吴小新编《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第一届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论文集》，第 35 页。

② 钟鸣旦：《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刘贤译，载吴梓明、吴小新编《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第一届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论文集》，第 35～39 页。



别加以解释，甚至将之解释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这一范式还假设观察者“正确地理解”了资讯，从而削弱了这一方法本身。此外，“接受”基本上被理解为被动的概念，忽略了外国的挑战。^①

3. 创新类范式

这类范式“以一个不同的前提为起点：事实并非就那么存在着，在用语言和形象表达的时候，事实被创新、被建构，也被创造出来。这同样可用于文化交流：传播者在走近接受者的时候，对接受者和接受者的文化建构了一种符号事实（言语）；这符号事实本身便成为影响接受者并对之施加权威的方式”。^② 使用这类范式的研究者通过比较，寻找传播者的表述与原文化的观念或世界观之间的对应性和不对应性，以表明传播者对于对方的看法是建立在自己欧洲文化的基础上的，也探寻这样的建构在欧洲向世界其他地方传播知识过程中怎样发生作用。这类范式的缺点是很可能会导致否定接受者的角色或位置。另外，观察者被认为是“正确理解”了他者文化，这有可能导致观察者去建构出新的历史事实。这种研究还可能会导致一种静态的文化相遇概念，看不到接受者主体性的影响所带来的动态变化。^③

4. 互动交流类范式

这类范式以前几种范式为基础，“试图从不同视角审视历史，希望更好地与他者（文化）交流”。^④ 它接受了交流包括传播，但认为传播是双向的，它并不以传教士为中心，而是将之看做对话的参与者。它的主要意图不是揭示影响，因此不会以评价成败作为研究的直接目的。它虽然以不同文化间的比较为主要工具，但主要不是寻求相等性，它力图去观察，而不是评价，并认识到观察也是具选择性的。它接受了交流包括接受，但是强

① 钟鸣旦：《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刘贤译，载吴梓明、吴小新编《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第一届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论文集》，第40~45页。

② 钟鸣旦：《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刘贤译，载吴梓明、吴小新编《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第一届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论文集》，第45页。

③ 钟鸣旦：《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刘贤译，载吴梓明、吴小新编《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第一届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论文集》，第45~49页。

④ 钟鸣旦：《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刘贤译，载吴梓明、吴小新编《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第一届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论文集》，第50页。

调接受是双向的。它不同于接受范式，并不把展示差异或不对应性作为目标。互动类范式试图理解文化相遇产生的创新，其内在联系如何。其起点是接受者在建构自己对现实的理解时，是否应用了传播者提供的含义（反之亦然）。通过展示彼此的关联，互动类范式试图解释不同的理解方法，而不是把创新看做误解。互动交流类范式并不否认中西方思想之间真正有不相容或误解，但也指出有相容和理解存在。他们同意更大范围的社会和文化决定了人类，也指出人类有能力疏离文化决定主义。在任何文化中，总是有人向别人开放，也总有人与主流文化保持距离。互动交流类范式重视创新范式关于传播者对他者的建构以及传播者与权威之间的关系，但反过来也重视接受者的创新和权威，它将传播者和接受者视为平等的参与者，共同参与社会文化的建构，但这参与总是受制于双向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处境。^①

互动交流类范式最根本的基础是身份认同的概念，它认为自我的身份不仅仅形成于个体孤立的努力，也形成于与他者的相遇，这一洞察会对互动交流本身产生影响。“互动交流范式建立在一种与他者的关系上，这个他者是‘关系中的他者’，其中自我与他者在互动之中。参与者的身份并非固定不变，他们的身份通过与他者的相遇而建立。”对人的身份认同的洞察也影响到我们的理解方式，“理解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与他者相遇的结果，这个他者或是人、或是文本、或是文化。在自我身份的转化中，对他者的理解也型塑了对自我的理解。因而这是一个不断对自我与他者的新理解之间互动的过程”。^②

互动交流类范式对研究文化相遇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传播类范式把他者作为“相对的他者”（relative other），研究者以自我定义他者，以自己的文化来衡量他者文化，下意识地寻找与他者的相似之处，结果把他者吸纳进自我之中，而未发生与他者的真正相遇。接受类范式把他者视作“绝对的他者”（absolute other），与自我是完全不同的，研究中力图发现自

① 钟鸣旦：《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刘贤译，载吴梓明、吴小新编《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第一届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论文集》，第50～53页。

② 钟鸣旦：《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刘贤译，载吴梓明、吴小新编《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第一届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论文集》，第53～54页。